

乾嘉時期先秦諸子學的興起

——以王念孫《讀書雜誌》為例

鄭吉雄

2004/11/1

一、問題的提出：治經與治諸子的關係

（一）清代諸子學的興起

個人多年來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始終對於學術思想之「變」懷抱高度的興趣。約於三年前，我重新思考到清代乾嘉學術如何轉變到晚清、又如何再折入二十世紀學術思潮的問題。傳統一般的看法，多認為晚清思潮轉變到近代中國思潮，其內部的原因主要與龔自珍、魏源(1794-1856)，和稍晚的康有為(1858-1927)等今文經學家及其辨偽經有關¹，而外在的原因則主要與西方科學思想的傳入有關。我於此一解釋始終不甚愜意。因為不論「疑偽經」抑或「疑舊傳統」，「懷疑」的意識與態度始終只屬於反面的因素。「懷疑」引起破壞是足夠的，但卻不足以引起新思潮的建立。而正如我們所看見的，二十世紀的前半段，許多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推動著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等變革運動，對於社會、倫理、科學、教育等各個課題、諸如男女平等、法律制度、倫理關係等各方面的價值觀，是有所建樹的，而非僅僅為破壞傳統而已。顯然地，引起近代中國新思潮的因素，不應該只有「疑古」這一類反面的因素，而應該還有一些重要的正面因素，而我認為，乾嘉以降學術界同感興趣的先秦諸子學，很可能就是這些正面的因素。梁啟超(1873-1929)在撰《清代學術概論》時曾說：

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以後，至清之中葉，諸子學可謂全廢。²

依照梁氏的看法，清中葉諸子學的復興，真可謂千古大事了。不過梁氏從歷史的

¹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均有說。近人嚴壽澂《嘉道以降漢學思想轉變一例——讀丁晏頤志齋文集》（《中國書目季刊》31卷3期[1997.12]），稱「道咸以下學術風氣的轉變，最顯著的是以魏源、龔自珍為領袖的今文學之興起。」

² 收入《近代中國學術論叢》（香港：崇文書局，1973年），頁87。我在2000年8月下旬於文哲所會議室曾提出本文初稿作為訪問報告，當時承林慶彰教授提示，周秦諸子之學在晚明亦曾復興，因此梁說有誤。我完全接受此一觀點。2001年8月9日下午我在北京大學勺園與人民大學黃愛平教授討論清代學術問題，承黃教授賜示，她剛指導一位博士生畢業，其論文即為研究晚明至清中葉的諸子學復興問題。略記於此。

角度看出清中葉以前諸子學的「全廢」，是向後面看³；稍後他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轉為向前面看，更進一步看出諸子學興起後思想界掀起的大波瀾。他說：

晚清「先秦諸子學」之復活，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⁴

清代諸子學的興起，經過梁氏點出，晚近學者都有所注意，如張灝《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文承續梁氏的看法，認為諸子學的興起，為影響晚清思潮的三大本土資源之一。此外，因為章太炎和近代中國諸子學的轉化深有關係⁵，因此研究章氏的學者大多注意到諸子學興起的問題。如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一書就有「晚清諸子學興起」一節專門討論。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一書第六章「關於經學、子學方法之爭」，也有相當詳盡的說明。因此這個問題可以說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受到學術界的注意。然而我仍認為諸子學如何興起的問題仍然未被清楚地探討出來。為什麼清中葉乾嘉經學極盛之後，至進入晚清時期，雖然經學研究風氣並未衰微，卻會忽然興起研究先秦諸子的潮流呢？諸子學和經學之間，又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經學大師王念孫積三十餘年歲月撰著《讀書雜誌》，其中諸子書竟佔超過一半的分量，這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上又有何意義呢？這些問題都是有必要探討的。

（二）「諸子」與「經」的關係

關於諸子和《五經》之間的關係，其實早在乾嘉時期章學誠（1738-1801）已經提出過一個特殊的觀點。《文史通義·詩教》說：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

換言之，戰國諸子專門著述的文章，是後世文體的重要始源。章氏又說：

戰國之文奇邪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

此處章氏直指戰國之文亦即諸子之文「源多出於《詩》教」，可以說非常清楚而堅定地為諸子與經學之間建立了一個橋樑，並不是泛泛之論。他又說：

³ 學者或以為梁氏之說不可信，清代以前諸子學實並未全廢，如《莊子》於唐代有成玄英《疏》；如晚明有三教合一的潮流，注莊解莊者亦頗不乏人。

⁴ 氏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四「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二）」（臺北：華正書局，1979年），頁273。

⁵ 胡適說：「到章太炎方才於校勘訓詁的諸子學之外，別出一種有條理系統的諸子學。」《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27。

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⁶

就如錢穆（1895-1990）所指出，章氏有許多學術觀點是得自《漢書·藝文志》的⁷。《漢志》上承劉歆（約元前53-後23）《七略》，為諸子之「流」找出「源」和「末流」⁸，但章氏《詩教》篇則指出，《詩經》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價值，是因為它是戰國諸子瑰瑋文章的源頭；而戰國諸子著述作為中國歷史上「私人著述」的起始點，又開啟了後世各種文體的大流。章氏的觀點，影響了稍晚的龔自珍（1792-1841）。《定盦文集·古史鈎沈論二》說：

《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歿，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蜂出泉流，漢氏校錄，撮為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稱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稱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實為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稱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⁹

這裡自珍論說的核心觀念仍是《漢志》的諸子出於王官論，認為經、史、子在先秦時期實為一體。不過他特別突顯「史」字，認為諸子所傳述諸如黃帝、神農之類，其書最早都為周史所職藏。

章學誠、龔自珍都未嘗撰寫過諸子學方面的專著。他們主要是以宏觀的視界、從學術思想發展的歷史角度切入，為晚周諸子定位。和章學誠同時期的汪中（1744-1794），曾研治《荀子》、《墨子》、《老子》、《晏子春秋》、《賈誼新書》，而撰成《荀子通論》、《墨子序》、《墨子後序》、《賈誼新書序》等文章，是諸子學說的專家。他提出「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為其道者也」¹⁰的觀點，截斷了《墨子》與儒家經學的關係。論荀子時，則稱「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¹¹，卻肯定了荀子和先秦經學的傳承大有關係。汪中而外，江瑔《讀子卮言》則提出：

⁶ 《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上冊，頁10-12。

⁷ 氏著：《中國史學名著》：「該問章實齋的學問究從那裡來？我想他特別是從《漢書·藝文志》來，又兼以鄭樵《通志》，而創出了章實齋討論古代學術一項重大的創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下冊，頁313。）

⁸ 就以前註所引「縱橫家者流」一段而言，「蓋出於行人之官」，「行人之官」便是「縱橫家」的一個「源」；而「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則是縱橫之術的「末流」弊端。

⁹ 《龔自珍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公司，1975年），頁21。

¹⁰ 汪中：《墨子後序》，《述學》內篇卷3（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頁5b。

¹¹ 汪中：《荀子通論》，《述學》卷4補遺，頁8a。

子中有經、經中亦有子。班氏《藝文志》之論諸子也，亦云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蓋《六經》既出於諸子，諸子亦可出於《六經》。¹²「《六經》既出於諸子，諸子亦可出於《六經》」二語，後一語依據《漢志》，是沒有問題的；前一語的主要依據是《六經》中《春秋》出自儒家創始人孔子，《禮》則多出晚周以迄秦漢儒者之手。總之，不少清儒對於諸子書非常重視，而上述這一類的言論多不是出於經儒之口。這是頗有意義、值得探討的現象。¹³

（三）治經與治諸子的問題

關於治經與治諸子的方法問題，光緒廿二年（1896）孫詒讓（1848-1908）為所撰《墨子閒詁》作序時已說：

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閒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義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者也。¹⁴

孫氏睇慕「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此一取向，不但因為他從許慎（30-124）《鴻烈閒詁》上獲得證明，更因為在他以前，王念孫已以治經方法治諸子而取得豐碩成果。孫詒讓是正統漢學家，以校勘訓詁治諸子典籍，因此對於諸子學與經學之間在研究方法上的傳承關係，說得非常清楚。其後於民國十二年（1923）一月，胡適發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暗示清代治諸子學最早的代表性人物為王念孫¹⁵。同年胡氏和章太炎討論「治經與治諸子」方法的異同問題。大致上胡適認為治經和治諸子都是用的「校勘訓詁」的方法，而太炎則指出「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研治方法上有著基本的不同，以校勘訓詁治諸子，亦只是「暫為初步」的工夫而已¹⁶。在這裡我們暫不討論章、胡之辯孰是孰非，總之他們和孫詒讓都指出了諸子學興起與清代經學風氣之間的密切關係。

至於稍早梁啟超在民國九年（1920）十月撰《清代學術概論》時則指出，

¹² 轉引自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化，1992年），頁28。

¹³ 關於諸子與經學之間的問題，拙著《先秦諸子繫年》與晚清諸子學思潮一文別有申論。

¹⁴ 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頁5。

¹⁵ 「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王引之們的治『經』；錢大昕、趙翼、王鳴盛、洪亮吉們的治『史』；王念孫、俞樾、孫詒讓們的治『子』；戴震、王念孫、段玉裁、邵晉涵、郝懿行、錢繹、王筠、朱駿聲們的治古詞典，都有相當的成績。」《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90年）第二集，頁2。又該年3月，顧頡剛發表著名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論及禹為「蜥蜴之類的動物」。

¹⁶ 詳參陳氏：《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第六章「關於經學、子學方法之爭」（臺北：麥田出版，2000），頁242-243。

清儒在治史學時旁涉校勘，校及諸子書，因而引起研究諸子學的興味¹⁷。這是首先講到治史方法與治諸子方法的關係的。其實，清儒自顧炎武、王夫之（1619-1692）、黃宗羲以降，到乾嘉時期的錢大昕（1728-1804），都喜談經史。經學和史學在方法上也常用得到校勘訓詁的方法。梁啟超的觀點，其實和孫詒讓、章太炎並無二致。

有一個極重要的要點，在這裡我必須指出：上述孫詒讓、章太炎二人之所以講得那麼清楚，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曾用校勘訓詁的工夫，對經書和諸子書下過實際的苦功，所以他們對治經和治諸子之間的內在關係，說得特別清楚。相對地，若只從一般性的學術史料來理解，就往往只能觸及表面而已。這就是為何在章太炎以後，注意到王念孫《讀書雜誌》的學者很多，但真正願意深入材料去探索治經與治諸子之間的關係的卻很少。

舉例而言，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對儒學傳統的衝擊》一書中就曾論及晚清諸子學的興起。王氏認為，清儒治諸子最初的動機，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子書被引為經學考證之助；其二為子書的義理價值被重新評估¹⁸。他針對「何以清學研究的範圍必日漸向更古遠的文獻翻上一層」此一問題，特別引用了俞樾（1821-1906）《諸子平議序》中「（諸子）其書往往可以考論經義，不必稱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可見」和「西漢經師之緒論已可寶貴，『諸子』又在其前歟」兩段話，指出俞氏對此一問題提供了最清楚的說明，也「對子書材料在經學考證上的價值何等重視」。然而，俞樾真的是用子書材料以作為經學考證之助嗎？據我的觀察是大大不然。《諸子平議》一書中運用的研究方法固然非常多，但絕大部分是以經書材料和經學考證成果，來考證諸子書的字辭文義。如卷一「管子一」「守國之度，在飾四維」說：

樾謹按：禮義廉恥，非由修飾。「飾」當讀為「飭」。《詩·六月篇》「戎車既飭」，毛《傳》曰：「飭，正也。」「飭四維」者，正四維也。飭與飾古通用。《易·雜卦傳》：「蠱則飭也」，《釋文》曰：「王肅本作飾。」《禮記·樂記篇》：「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復亂以飾歸」，並其證矣。¹⁹

本條資料為全書第一條，其中俞樾用了《詩經》經傳、《周易·雜卦傳》、《經典釋文》、《禮記·樂記》和《史記·樂書》等幾種經史材料來證明《管子》書裡一句話中的一個字的字義。此可見俞樾並不是「對子書材料在經學考證上的價值何等重視」，而是「對經書材料在子學考證上的價值何等重視」。當然俞樾並非只是用經書來證明子書，有時也會用另一子書以考證此一子書的文義。如卷二十一《韓

¹⁷ 「清儒 所校多屬先秦諸子，因此引起研究諸子學之興味。」《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47年），頁87。

¹⁸ 參氏著：《章太炎的思想》第二章第二節「晚清諸子學興起」。

¹⁹ 俞樾：《諸子平議》（臺北：世界書局，1973年），頁1。

非子》「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條：

樾謹按：「危」讀為「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雄按：下略）²⁰這一條是藉由比較《呂氏春秋》與《韓非子》意義相近的文句，來證明《韓非子》「君行危矣」的「危」字應讀為「詭」，等於用的諸子互相釋證的工夫。《諸子平議》中考證的類例十分多，我暫時無法在此一一舉例說明。總之，俞樾雖然在《諸子平議序》中舉出例證，大談諸子書如何可以「考證經義」，但當我們細讀該書時，卻竟然發現他是大量地反過來用經書考證諸子之義。當然俞樾沒有任何掩飾的理由，但《諸子平議》實際的研究取向，與該書序中所宣稱的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落差，也不是毫無原因的。俞樾任教於詁經精舍，在著《諸子平議》之前已先著成《群經平議》²¹。作為一代經師，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公開地將諸子書的價值推崇到和經書等同的地步。事實上，他在序中強調「西漢經師之緒論已可寶貴，『諸子』又在其前矣」，已經充分地肯定了諸子書的價值了。從《諸子平議》的內容來看，我們明明看到他的觀點是「經書往往可以考論諸子義」而非「諸子書往往可以考論經義」，我實無法相信俞樾之治諸子書，是要「引為經學考證之助」。

回到討論王念孫，究竟王念孫撰《讀書雜誌》，又是否要「引為經學考證之助」呢？蕭義玲從方法論的發展看清代諸子學的興起一文曾指出，王念孫治諸子書，最初的動機，很可能不過是藉以將考覈古代語言的基礎，由「經史」擴大為「經史子」而已²²。我認為在某一層面來說蕭氏的推論是合理的；但蕭文完全沒有提及《讀書雜誌》所運用的方法在諸子學上的意義，似尚有未達一間的遺憾。《讀書雜誌》包含了數千條考證，對於一般讀者而言，確實不容易首尾卒讀，當然也很難令人聯想到：長於校勘訓詁的王念孫，竟會和諸子思想或諸子學思潮有關聯。

至於陳平原「關於經學、子學方法之爭」一文，也沒有深入討論《讀書雜誌》、《諸子平議》等書的內容，只是刻意強調治經與治諸子的方法截然不同。他引申太炎觀點，認為乾嘉以降的漢學家以「校勘訓詁」治諸子只是一個「暫為初步」的方法而已。陳氏意謂：因為諸子書多明義理，所以若不深入其哲理內容，實在不能算是真正研治諸子。他說：

²⁰ 俞樾：《諸子平議》頁240。

²¹ 據鄭振模：《俞曲園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俞氏於同治元年（1862）撰成《群經平議》，同治九年以前完成《諸子平議》。

²² 關於此一問題，讀者可參蕭義玲從方法論的發展看清代諸子學的興起，《孔孟學報》75期（1998.03），頁153-168。

若是經師治學，只講音韻訓詁名物制度，如此讀書倒也無大礙；可是一旦由「多陳事實」的「經」轉為「多明義理」的「子」，清儒之「不尚空談」便成為明顯的缺陷。²³

陳文也特別闢一節論述「清儒之得失」，一再強調清儒的治學窠臼：過度強調文獻實證、而無法了知玄理。他指出「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的章太炎，既掌握了以校勘訓詁的治經治諸子的基本方法，又以其佛學和魏晉玄學的素養²⁴切入莊子和先秦諸子的哲理，才得以超越了窮守經籍的清儒，在諸子學上獲得真正的突破。而這也是處處推崇清儒治學方法的胡適既不能理解、又不能望其項背的地方。

在這裡我對於陳氏忽略清儒的理想性這一點暫置不論，首先我必須指出，陳氏似乎過於強調校勘訓詁和窮索玄理之間的「異」，而看不出二者之間的內在關係之「同」。另一方面，他也沒有指出太炎治諸子學那種求真求是的精神的來源。照陳氏的講法，王、俞等以「校勘訓詁」治諸子的學者，和諸子玄理思想的發皇，二者之間是可以沒有關係的，因為前者只是清儒典型的文獻實證工夫而已，後者則是清儒所不擅長，也就是清學的「致命弱點」²⁵。然而有一個重要的考慮，陳氏似乎完全忽略了：太炎雖然超越了那些皓首窮索文獻的經儒，透過佛學和玄學的素養轉入哲理的層次以研治諸子；但太炎的「超越」，並不代表對校勘訓詁的背叛和蔑棄，而是百分之百立足於校勘訓詁之上。我們若回到太炎引以自豪的《齊物論釋》，他在書中雖博徵內典如《毘婆沙論》、《解深密經》等以釋「齊物」義，但其中發揮內典的地方，亦往往植根於《莊子》的舊注舊訓之上。如太炎釋「齊物論」本文「縵者」、「窖者」，說：

「縵者」，簡文云寬心；應是散意，亦謂率爾墮心，不串習境，無欲等生，乍有所感，名率爾墮心也。「窖者」，簡文云深心；此即是尋求心，密者精心，恆審思量，所謂慧也。²⁶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太炎自「應是散意」下迄「名率爾墮心也」一段針對「縵者」一詞而暢論名相問題的分析語，是以簡文帝《注》「寬心」二字為基礎引申出來的；同樣地，他對「窖者」的詮解，自「此即是尋求心」下迄「所謂慧也」一段文字，亦是從簡文《注》「深心」二字引申出來的。若無傳統注釋「寬心」、

²³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頁 250-251。

²⁴ 陳氏稱：「隨著對魏晉玄學領悟的日益深入，章氏一改晉人治經『附會鑿空』的舊說。章太炎注意到魏晉學者不再獨尊儒術，而是廣採眾說，自立新義，旁理諸子，探研佛典，多『覃思自得』，故『真以哲學著見者，當自魏氏始』」（原注：案唐，《章太炎全集》卷三，頁 451）。章太炎自稱中歲以後宗師法相，兼事魏晉玄文，方才明白清學的這一致命弱點。」《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頁 250。

²⁵ 同前註。

²⁶ 章太炎：《齊物論釋定本》，《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六冊，頁 67。

「深心」的訓解以為基礎，試問太炎要如何從《莊子》原文「縵者」、「窖者」兩概念，一下子跳躍到後面一段充滿內典理趣的引申義？我們若一定要將校勘訓詁和索解玄理一分為二，將前者形容為對諸子義理的探討毫無幫助，那麼面對上引《齊物論釋》這樣的例子，試問我們又要如何解釋？

其實太炎反駁胡適、強調以「校勘訓詁」的治經之法治諸子只是王、俞等學者「暫為初步」的工夫這段話，自有其立言背景。倘若我們以此推論到：「暫為初步」的工夫無與於玄理哲理的闡發，我想即使起太炎於地下，他亦不會同意。我也認為，必須先深入地透過《讀書雜誌》和《諸子評議》來認識王、俞二儒的「校勘訓詁」究竟做了那些工作，才能判定校勘訓詁和窮索玄理之間存在什麼樣的內在關係。唯有了解二者之間的內在關係，吾人才有可能進一步了解到，諸子書中義理的發皇，其實早在王、俞的校勘訓詁中已奠定了基礎。就如我在前文所指出的，章太炎和孫詒讓之所以對於諸子學與經學之間的關係說得那麼清楚，正是因為他們深悉校勘訓詁的實際材料的緣故。

我始終堅信校勘訓詁和諸子義理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事實上，乾嘉以降的鴻儒碩彥多受經學訓練，其研治諸子的方法，自不得不從治經方法中尋繹而得；而究其研治的最後結果，又不得不於諸子異於儒學理念的思想觀念，包括政治、社會、倫理等各方面，有所發明，漸而反權威、平等、名理邏輯等各種問題與課題，均漸被發掘、被重視、被討論。因此追究起來，近代中國思想激變的重要源頭之一，很可能就是晚清大盛的先秦諸子研究；而晚清諸子學的興盛，又必然可以從「乾嘉學術」這個更早期的學術思潮中找到線索。這是我近年來的一個思路，也是我嘗試從博大浩瀚的《讀書雜誌》中找尋蛛絲馬跡的基本原因。

二、 王念孫及其《讀書雜誌》簡介

（一）王念孫生平簡介

王念孫，字懷祖，號石臞，高郵（舊屬揚州府）人，生於乾隆九年（1744），卒於道光十二年（1832），得年八十九歲。父親王安國，為雍正二年（1724）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念孫年少好學，遍讀經史，十餘歲時父親聘戴震為塾師，開始受業於戴氏。乾隆四十年中進士（1775），選翰林院庶吉士，後歷工部主事，陝西道御史等職。嘉慶四年（1799）仁宗親政，念孫援據經義首劾大學士和珅，得到嘉獎，授直隸永定河道；兩年後因河隄漫口而罷官。未幾轉任山東運河道，後復任永定河道，嘉慶十五年（1810）提出引黃河入運河的建議，永定河再度漫

口，於是念孫引罪辭官，得旨以退休致仕。自此潛心著述。平生所著書有《廣雅疏證》十卷、《讀書雜誌》八十二卷餘編二卷、《古韻譜》二卷、《說文考異》二卷、《丁亥詩鈔》一卷、《王石臞先生遺文》四卷等。其中《疏證》、《雜誌》與念孫子引之所輯撰《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合稱「高郵王氏父子四種」，是乾嘉時期極負盛名的著述。

念孫《廣雅疏證》「就古聲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無所不達」²⁷，主要是聲韻訓詁之學的論著，而《讀書雜誌》雜考子史以至於漢隸，這兩部書看似和經學沒有直接關係。但我們必須認清王氏父子是正統的經學家，而不可誤以為他們是零零碎碎的考據家。首先念孫於諸經的考訂，其成果大量集中在《經義述聞》中，亦即引之所稱「家大人」的部分。焦循（1763-1820）說：

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丘。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壇，王懷祖父子名于高郵，錢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于其間乎！²⁸

據《清史列傳》卷六十八念孫本傳說：

論者謂清代經述，獨絕千古。高郵王氏一家之學，三世相承，自長洲惠氏父子外，蓋鮮其匹云。²⁹

王氏父子以經術輝耀史冊，主因即在於其治經方法的縝密，他們在校勘、文字、聲音、訓詁、名物考訂等各方面的精密，在學術界是膾炙人口的。莊雅洲也曾指出王氏父子「因聲求義」的治經方法³⁰；陳祖武甚至評「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則專精校勘訓詁，較之戴震，實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³¹，又認為「王氏父子之學，以文字音韻最稱專精」，「乾嘉學派之于音韻學，因係為治經服務」³²。

（二）王念孫與戴學一脈求真求是的精神

²⁷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9（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頁248。

²⁸ 焦循：《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雕菰集》（收入《文選樓叢書》，《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卷13。

²⁹ 蔡冠洛編纂：《清文列傳》（臺北：啟明書局，1965年）

³⁰ 氏著：《論高郵王氏父子經學著述中的因聲求義》，收入《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上冊，頁351-406。

³¹ 陳祖武：《關於乾嘉派的幾點思考》，《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頁257。

³² 氏著：《清儒學術拾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84-185。

先秦諸子創造出輝煌的百家爭鳴時代，既各有其理想性，則必然各有其所求之真及所求之是。正因為其求真求是，以致於各自堅持，彼此批評，互不相讓。

回到清代諸子學興起這個課題，從王念孫「校勘訓詁」式的治諸子到章太炎的「多明義理」式的治諸子，也都有一種求真求是的精神。這種精神應該是起源於戴震。戴氏治經，是以求真求是為最高目標。依章太炎《清儒》一文的講法，乾嘉學術中戴震的皖學是以「綜形名、任裁斷」為主³³。「形」即事物形體，「名」即文字³⁴，「綜形名」即綜理名實，探究文字語言與事物實體之間的關係；「任裁斷」，即在綜理名實的基礎上斷定其是非真理所在。戴震重視文字聲音訓詁，能以字形、聲音和訓詁考釋古代禮、數、制度；而戴氏的終極關懷，則在於透過疏證字義，以獲得義理。戴氏的求真求是的精神，表現於論學，則有「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宗旨³⁵。他的學生以金壇段玉裁及高郵王氏父子最傑出，與他合稱「戴段二王」。如梁啟超曾指出，讀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

則「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說非是」諸文，到處皆是。³⁶

顯示段氏具有吾愛吾師、而猶愛真理的求真求是的精神。至於高郵王氏父子校勘訓詁的精到，學術界論者已多，不必贅言³⁷。而王氏父子求真求是的精神，與戴、段是一致的。王氏父子既重求是，又重考古，而求是的優先順序恐怕尚在考古之前。引之就曾經批評惠棟，說：

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于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說《周禮》丘封之度，顛倒甚矣，他人無此謬也。來書言之，足使株守漢學而不求其是者爽然自失。³⁸

王氏父子標舉「求是」的大纛，事事堅持要「論是非」，而反對「株守漢學」，這是最明顯的例證。從戴震的「求至道」³⁹、「反蔽」⁴⁰，到王氏父子的「求是」，

³³ 清儒：「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473。

³⁴ 《論語》「必也正名乎」鄭玄《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又《儀禮·聘禮》鄭《注》：「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³⁵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一：「『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語，實震一生最得力處。」頁58。

³⁶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一，頁72。

³⁷ 方俊吉：《高郵王氏父子之學研究》第三章「王氏父子之學風及治學方法」提出八點總結王氏父子的治學方法，分別為務根基、正門徑；重條理、詳分析；明句讀、精校讎；審聲音、申古義；析詞性、辨虛實；博采證、慎闕疑；謹歸納、善發明；觸類旁通。（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頁53-136）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十四「高郵王氏父子校釋古籍之方法與成就」則提出五點：分別為依據聲韻、辨識通假；比對異文、校正訛誤；覓求佐證、勘定衍脫；綜舉成語、研索古義；推尋文義、判斷事理。（臺北：學生書局，1988年，頁210-235。）

³⁸ 致焦里堂書《焦氏遺書·卷首》。

³⁹ 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東原文集》卷9，《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4-1997）第六冊，頁370。

⁴⁰ 戴震《答鄭丈用牧書》，同前註，頁373。

到太炎的「轉俗成真，回真向俗」的「求真」，其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要特別強調的是，同為求真精神，戴氏、王氏父子與章太炎之間，也有相異的地方。戴震對於宋學尤其是程朱深致不滿，而對於他自己所掌握的數學、天文、地理、文字、聲音、訓詁等各方面的經學之知具有強烈自信，並相信只有經由這些知識，透過這些方法，才能得到經中之理。不過有人或許以為戴氏也是尊信古籍，只有純客觀的歸納而無演繹，這一點，拙著《乾嘉學者治經方法與體系舉例試釋》中已經有所闡述。在這裡我願意再舉另一例以說明。眾所周知，戴震重視治經要「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⁴¹，但他為《毛詩補傳》撰序，起首即強調孔子「思無邪」一語的重要性，接著說：

余私謂《詩》之辭不可知矣，得其志則可通乎其辭；作《詩》之志愈不可知矣，蔽之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可通乎其志。

照戴氏的意思，治《詩》者運用孔子「思無邪」一語以通達詩人的「志」，得詩人之志則可通《詩》之辭。這樣一來，「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便變成「由道以通其志，由志以通其辭」，整個邏輯似乎倒過來了。此可見戴氏治經始終有一種潛在的極度重視思想義理的意識。這當然不代表他自相矛盾，毋寧說是因為他深知在詮解經典的過程中，先有義理然後訓辭詁字、抑或先有訓詁然後發揮義理，原本就是一個相互為用、而非此先彼後的絕對關係。戴又稱《補傳》：

就全《詩》考其名物字義於各章之下，不以作《詩》之意衍其說，蓋名物字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詳而覈之。古籍具在，有明證也。作詩之意，前人或失之者，非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也，姑以夫子之蔽夫三百者，各推而論之，以附於篇題後。⁴²

我們若細讀《補傳》，不難發現戴氏於各章之下除了引《毛傳》《鄭箋》之外，還要據古籍考覈名物字義。至於篇題之後，則用孔子「思無邪」這句話來推論作詩之意。名物字義和作詩之意必然都包含了戴震獨到的心得，《毛傳》《鄭箋》往往反而只能作為輔助而已。換言之，戴震的求真精神，不但以他素所自負的訓詁考據方法為基礎，也包含了相當高度的主觀性。至於《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則更帶有濃厚的演繹和批判色彩了。

王氏父子在求真精神上和戴氏則大不相同。他們治學一方面是表現在客觀地將一切本證、旁證以及相關的資料全部有系統地臚列出來，以證成一個結論的方法；另方面則是表現在對於對錯是非的執著，絕對超越於師生、朋友、傳統、倫理等世俗的價值。王氏在《讀書雜誌》雜引了許多同時期優秀的學人朋友如顧

⁴¹ 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同前註，頁370。

⁴² 戴震《毛詩補傳序》，《戴震全書》第一冊，頁125。

廣圻（1766-1835）、孫星衍（1753-1818）、畢沅（1730-1797）等學者的校箋，遇到他們說錯的時候，也是直指其誤，絕不苟簡。至於章太炎在杭州詁經精舍追隨過俞樾，受俞氏的影響甚深。從王念孫的治諸子學到俞氏的《諸子平議》，以至章太炎的《膏蘭室札記》《莊子解詁》等，治諸子的方法與傳統本已為兩次轉手，但王氏那種極度嚴謹於證據和推論的風格，卻不稍衰。戴學一脈相傳的求是求真的精神，和先秦諸子執著真理的精神是很容易產生共鳴的，無怪乎王氏父子和極推崇戴震的章太炎，對於諸子書都有著高度的興趣、並願意埋首其中了。

（三）《讀書雜誌》簡介

《讀書雜誌》正編共八十二卷、另餘編二卷。《正編》討論《逸周書》、《戰國策》、《史記》、《漢書》、《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內篇》、《漢隸拾遺》等子史之書共十種；《餘編》上卷討論《後漢書》二十一條、《老子》四條、《莊子》三十五條、《呂氏春秋》三十八條、《韓非子》十四條、《法言》八條；下卷《楚辭》二十六條、《文選》一百一十五條。合計數千條的考證，絕大部分是王念孫所撰，但其中也有王引之記的，約六百餘條；顧廣圻記的有四十三條；又如《淮南內篇》也曾引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的考證。關於《讀書雜誌》的撰著年代，《正編》十種中，大部分都有念孫所撰 敘，敘中通常有說明；但如《淮南內篇雜誌》、《漢書雜誌》沒有 敘，也就沒有直接的說明。賴炎元評介王念孫的讀書雜誌⁴³及戴文和王念孫《讀書雜誌》之介紹⁴⁴都有述及《雜誌》各種的撰著年代，其中賴文考證較為翔實。他指出：

念孫從嘉慶元年（1796）寫成《廣雅疏證》後，就開始寫《讀書雜誌》，到他去世的前一年（道光十一年[1831]），先後化了三十六年的時間，才完成這部鉅著。⁴⁵

根據他的考訂，《讀書雜誌正編》十種寫成的年代，分別為：

- 1.《漢隸拾遺》一卷，嘉慶十五年（1810）前後完成。
- 2.《戰國策雜誌》三卷，嘉慶十六年（1811）完成。
- 3.《淮南內篇雜誌》二十二卷，嘉慶二十年（1815）完成；《補遺》一卷，顧廣圻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寫成。
- 4.《史記雜誌》六卷，嘉慶二十二年⁴⁶（1817）完成。
- 5.《漢書雜誌》十六卷，嘉慶二十三年（1818）完成。

⁴³ 刊《中國國學》第3期（1974.12），頁153-167。

⁴⁴ 刊《僑光學報》10期，（1992.10），頁1-40。

⁴⁵ 《中國國學》第3期，頁157上。

⁴⁶ 原文誤植為二十三年。

- 6.《管子雜誌》十二卷，嘉慶二十四年（1819）完成。
- 7.《荀子雜誌》八卷，道光九年（1825）完成；《補遺》一卷於翌年完成。
- 8.《逸周書雜誌》四卷，道光十年（1830）完成。
- 9.《晏子春秋雜誌》二卷，道光十一年（1831）完成。
- 10.《墨子雜誌》六卷，道光十一年（1831）完成。

至於內容方面，學術界的讚語，於此不贅。其特出的地方，除了學者提出的精校勘、重訓詁、重歸納、審字形之類，還有發凡起例的貢獻，即主要在《淮南內篇雜誌·敘》中，念孫將他校《淮南子》時所發現錯誤，分析歸納為六十二類⁴⁷，為當代校讎學奠定了基礎。江蘇古籍出版社於1985年印行的《讀書雜誌》，前有趙振鐸所撰《弁言》，對於王氏父子在書中所運用的校勘訓詁方法有很詳細的分析，讀者可參考。

三、《讀書雜誌》對諸子義理的發皇

太炎曾敘述治諸子學的難處如下：

訓詁恢奇，非深通小學者莫能理也；其言為救時而發，非深明史事者莫能喻也；而又淵源所漸，或相出入，非合六藝諸史以證之，始終不能明其流別。近代王懷祖、戴子高、孫仲容諸公，皆勤求古訓，卓然成就，而後敢治諸子。然猶通其文義，識其流變，才及泰半而止耳。其艱澀難曉之處，尚闕難以待後之人也。若夫內指心性，旁明物曲，外推成敗利鈍之故者，此又可以易言之耶？⁴⁸

太炎提出的「訓詁恢奇」、「內指心性」、「旁明物曲」，在在說明了先秦諸子書本質上是既涉及訓詁的問題，其內容又深入到心性與事物之理。我在上文曾指出校勘訓詁與發明義理都是研究諸子書的必要條件，絕不能一刀切斷，太炎此一論點，恰好證明了我的觀點。因此就其全體而言，治諸子書的人非但要深通小學以「通其文義」，還要「深明史事」以了解其救時之心，又要融合《六經》古史之知識，以「識其流變」。然則治諸子書者豈可謂「多明義理」即可盡其能事？清儒的不尚虛談，至少在「深通小學」、「合六藝諸史」兩方面出入無礙，又豈可稱之為「明顯的缺陷」？事實上，先秦諸子無論是《老子》、《莊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每一部典籍都包含了上述這些要點：既聯綴故訓而成文義，

⁴⁷ 詳參賴炎元 高郵王念孫引之父子的校勘學，刊《中國學術年刊》第10期（1989.02），頁216-219。

⁴⁸ 《時學箴言》，轉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661。

亦鋪陳文義而記史事；或於史事中闡述心性，或內指心性而旁明物曲。總之每一「子」的思想都是一個整體。這個道理看似簡單，但當我真正閱讀《讀書雜誌》後，更深深感到：王氏父子如果沒有對諸子的思想義理有一定的把握，校勘訓詁對於某些問題來說根本無從下手；而相對地，當王氏父子做校勘訓詁時，即使所闡釋的是最單純的命題或概念，只要該命題或概念涉及義理，該部子書所蘊涵的哲理性即不可避免地成為《雜誌》內容的一部分。

王念孫《讀書雜誌》中疏證諸子書中的訛誤，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諸子書文字訛誤致文義不明，而王氏加以闡明者；有王氏未闡明文義，謹引述內容，指陳訛誤者；有舊注誤解文義，王氏辯正之者；有舊注不誤，原文傳抄訛誤，王氏藉舊注以明文義，以正訛誤者；有舊有脫文，而王氏補充之者。不一而足，限於篇幅，暫不一一論述。以下分點說明《讀書雜誌》對諸子義理發皇的方式，暫分十一點論述：

（一）所引子書內文富含義理性

如章太炎所云「諸子多明義理」，尤其要注意的是，諸子的義理和儒家經典的義理之間，不論是政治理念、人生價值、歷史傳述、宇宙觀、心性論等各方面，往往都大相逕庭。念孫在《讀書雜誌》中雖然以考證訛誤、補闕析疑為主要工作，但即使不就引述的原文作思想性的分析或義理性的發揮，只要原文本身具有哲理性，讀者在研讀《雜誌》時，絕不可能絲毫不受其影響。尤其王氏撰《雜誌》以釐清諸子文義語義為主，這些具思想性、哲理性的原文在《雜誌》中容或瑣碎不具系統，但累積起來，配合王氏的疏釋，其中的意義也能呼之欲出，足以提供後人如俞樾、章太炎等精思博識的學者充分的啟發，俾使其可以站在前人的基礎上，綜理諸子的思想。這一類的情況和例證在《雜誌》中最多，如《管子》多論治道，《雜誌》「管子·第三·民力必竭」條說：

「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引之曰：「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號令禮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懲，莫肯竭力以事其上矣。（原注：〈君臣篇〉曰：「群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無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畏」，此云「民力不竭」，義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不竭。乃理之必然者，故曰數也。（雄按：下略）⁴⁹

本條所用的方法，引上文「民不勸」、「民不畏」和「民力不竭」互證其「義相因」，

⁴⁹ 《讀書雜誌》（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434。

即用「本章本篇自證」，是本證法中最為核心的方法，也是王氏父子最常用、最重視的方法之一。「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不竭。乃理之必然者」五句，固然涉及治術的問題，和乾隆末嘉慶初中國的政治社會情況，恰可以相喻。又「管子．第五．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念孫案：「治而未必富也」，當依朱本作「而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例。道者，由也。

（原注：見〈禮器〉、〈中庸〉《注》）尹注誤解「道」字。⁵⁰

雄按：與前例一樣，本條亦用「本章本篇自證」的方法，強調「與下文一例」。念孫此段案語頗短，所指出的訛誤亦不甚嚴重，但所論為屬政治的理論、統治階層所關心的課題。「治未必富，富未必強，強未必勝，勝未必制」堪為統治者詳參。治亂、貧富、強弱等觀念，也是《老子》、《韓非》、《商君書》時常討論的治術問題。關於個人修養方面，如「管子．第二．章書」：

「深而跡，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循理而不迷」。（原注：今本循作脩，非。辯見前「循誤為脩」下。）念孫案：「書」當為「畫」，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皆循其理而不迷也。《楚辭．九章》「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注》曰：「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與此同。⁵¹

這一條中念孫所闡述的「先王法度」、「仁義」、「不易其行」等概念，亦是儒家恆言，足以與儒家思想相發明。修養道德、循理不迷，對於儒者而言，固然為不可移易的價值觀念，但其實這一類的道德價值，在先秦諸子之間往往是共通的，並非儒家所專有。

（二）子史之間亦可有衍生、承續、因襲的關係

《雜志》「管子．第一．循誤為脩」：

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脩，亦當為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官使自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諸葛亮傳．評》曰：「循

⁵⁰ 《讀書雜誌》頁 454。

⁵¹ 《讀書雜誌》頁 429。

名責實，虛偽不齒。」皆本於《管子》也。⁵²

雄按：以上申明循名責實之義，可以與下文「名實之辨」的材料互看。名實問題是名家思想的重點，《史記·太史公自序》記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亦以為名家「控名責實，參互不失」。然而王氏提示《韓非子》、《淮南子》、《後漢書》、《三國志》關於「循名責實」的理念，其實都是「本於《管子》」。這無疑讓讀者明白：無論諸子抑或史家，無論其為晚周抑或漢魏，知識分子都重視名實問題，而「循名責實」的觀念，也可能以《管子》為最早，因而法家的《韓非》、道家的《淮南子》，史書如《後漢書》、《三國志》，都受其影響。換言之，先秦諸子之間不但語言和思想觀念可以互證，與後世的政治學術思想亦可聯繫於同一脈絡中貫串而比較。

（三）治術

《管子》書中論治術之處十分多，涉及道家、法家甚至部分儒家的思想也所在多有。舉例而言，如《雜誌》「管子·第一·不可不審」條，說：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念孫案：「審」，本作「重」。此言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雄按：下略）⁵³

又「管子·第五·善攻」：

「理世不在善攻」（原注：理本作治，此避高宗諱改）。念孫案：治世與善攻，兩不相涉。《通典·兵三》引作「治世不在善政」，是也。治世不在善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在於權宜」。⁵⁴

雄按：「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一點，涉及治人及治法的問題，可與「善攻」條互相參看。治人治法的問題，在清初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及晚清朱一新（1846-1894）《無邪堂答問》中都有論及。念孫雖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書作「不可不重」而改此條，但在材料的取舍之際，卻顯示了念孫的思想。讀者讀「善攻」條中念孫的解釋「治世不在善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自不難明瞭。又「晏子春秋·第一·明君不屈民財、不窮民力」條說：

「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念孫案：此文本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屈」者，竭也（原注：見《呂氏春秋·慎勢篇注》、《淮南·原道篇注》），言君竭民之財，將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窮民之力，將以為樂也，而必不得其樂。故下

⁵² 《讀書雜誌》頁412。

⁵³ 《讀書雜誌》頁414。

⁵⁴ 《讀書雜誌》頁450。

文云「嬰懼加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床之樂」也。今本「君」上衍「明」字。(原注：此涉下文「不遵明君」之義而衍。)「屈」、「窮」二字上又各衍一「不」字 (原注：此涉下文兩「不得」而衍)，則義不可通矣。⁵⁵

本條與中國傳統重視民生民力、藏富於民的政治思想有關。論者多知清初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上承《孟子》而有貶抑君權的民主意識，而念孫此條則說明了《晏子春秋》亦頗有儆君尊民的思想，實值得吾人注意。

(四) 名實

名實之辯是中國思想史上延續了二千餘年，極受每一時代知識分子重視的課題。《雜誌》所論以「名實」為主要觀念的資料，除前引《管子》「循誤為脩」一條外，還可注意以下四條，首二條為荀子論大共名大別名。《雜誌》「荀子·第七·共則有共」：

「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念孫案：「共則有共」之「有」讀為「又」，謂共而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也。楊說失之。⁵⁶

念孫糾正楊倞《注》的謬誤。「有」讀為「又」幾乎是讀先秦古籍的常識，念孫於此不憚煩複，再加申論，更進一步釐清了荀子「大共名」的觀念。又「荀子·第七·遍舉之」：

「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念孫案：此「遍」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為主，故曰「遍舉之」；此條以異為主，故曰「別舉之」(原注：下文皆作「別」)。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原注：若雉有五雉、雇有九雇，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原注：「有」讀為「又」，見上條。)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遍舉」，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遍舉」而誤。楊說皆失之。⁵⁷

本條可見念孫訓解「大別名」，並不僅恃校勘訓詁而已。此條辯論特詳，念孫特別加注說明「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應該就是運用《公孫龍子》「馬者命形，白者命色，命色非命形」的「白馬論」的觀念。經他一解釋，則荀子「大

⁵⁵ 《讀書雜誌》頁 527。

⁵⁶ 《讀書雜誌》頁 723-724。

⁵⁷ 《讀書雜誌》頁 724。

別名」的觀念，亦得以更清晰了。此外，「管子·第六·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念孫案：此皆以四字為句。「治」下「之」字，涉上文「物至而治之」而衍；「奇身名廢」，當作「奇名自廢」。「自」與「身」相似，又因下文兩「身」字而誤為「身」，又誤倒於「名」字之上耳。尹注曰：「奇，謂邪不正也。」「正名自治」、「奇名自廢」相對為文，謂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也。〈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是其證矣。「倚」與「奇」通。⁵⁸

雄按：此條以 樞言篇 與本篇互證。念孫闡釋文義「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可見其為透過掌握文義以實踐校讎。此處管子強調「正名」的重要性，亦可以與《論語》正名思想互喻。由於念孫注意到名實關係為先秦諸子所共同關注，他也曾以此一認知判斷諸子書的句讀。如「管子·第六·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條說：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念孫案：此以兩「治」字絕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與「名」正相對也。⁵⁹

在這連成一氣的二十七字中，念孫成功地加以校正，主要就是掌握了名實觀念的緣故。

（五）形氣神

形氣神的問題，是道家恆言，儒家經典中，唯《周易》發揮最多。「淮南內篇·第一·生之充·二者」條說：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念孫案：「充」，本作「元」，此涉下文「氣不當其所充」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為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語即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二者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二者皆傷也。各本「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而誤。（原注：《文子》亦誤作「三」。）唯道藏本、朱本作「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⁶⁰

雄按：念孫發現後世引用《淮南子》的書籍，「生之充」均作「生之元」或「生

⁵⁸ 《讀書雜誌》頁 470。

⁵⁹ 《讀書雜誌》頁 468。

⁶⁰ 《讀書雜誌》頁 772。

之原」。不過他取「元」而捨「原」，而以「元者，本也，言氣為生之本也」三語加以說明。「二者傷」各本作「三者傷」，只有道藏本和朱本作「二」。念孫取「二」而捨「三」，亦顯然是基於他對於「形氣神」三者之間關係的理解。

（六）士行

儒家學說外王內聖兼重，因此對於士行的問題，討論最詳。但先秦諸子，對於此一問題未必無所發明，而所發明，亦應可以與儒說互證互喻。「晏子春秋·第一·若其衣服節儉」：

「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眾悅也」。案：「若」當為「善」，字之誤也。（原注：〈諫上篇〉：「公曰善」；〈雜下篇〉：「以善為師」，今本「善」字並誤作「若」。）懷其德，歸其義，善其節儉，三者相對為文。

惟其善之，是以悅之。今本「善」誤作「若」，則義不可通。⁶¹

「唯其善之，是以悅之」兩句話，是在糾正「若」為「善」字之後，進一步釋該句的意思。又「墨子·第一·待祿、憂反」：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念孫案：「待」當為「持」，「憂反」當為「愛交」。持，猶守也。（原注：《呂氏春秋·慎大篇注》）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為己而不為國家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⁶²

「愛交」一詞在《墨子》書中頗為常見。墨子倡兼愛，雖然在儒家學說的評價下有「二本」的嫌疑，而為歷來儒者所不道；但依本條所引「七患」本文可見，墨子言「仕者持祿，游者愛交」，批評第四患「為己而不為國家」的人，其重公輕私的思想，其與儒家理念又豈有二致？又「墨子·第三·昔、用偏、循身」：

「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念孫案：此文本作「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原注：與遍同），近以脩身」。言君子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則所施周遍，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周」作「用」，「脩」作「循」（隸書脩循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則義不可通。⁶³

此條念孫並不以其他鈔本或他書引文校勘，而是直接依文義及字形可能訛誤的方向判斷。墨子言兼愛，與孔孟言仁義不同；但念孫解釋《墨子》文義，特稱「言

⁶¹ 《讀書雜誌》頁 528。

⁶² 《讀書雜誌》頁 561。

⁶³ 《讀書雜誌》頁 595。

君子之行仁義」云云，以儒釋墨，頗堪玩味。又「墨子·第三·苟生、苟義」：

「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畢云：「苟，苟且。」念孫案：畢說非也。「苟」讀為「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說文》：「苟，自急救也。從羊省，從勺口，勺口，猶慎言也。（原注：舊本誤作「從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今依段《注》改。）與苟且之「苟」從艸者不同。「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者，「曩」，謂在陳蔡時也；「今」，謂哀公賜食時也。（原注：具見上文）苟，急也。言曩時則以生為急，今時則以義為急也。⁶⁴

本條所引，出「非儒下」。念孫所得結論，與畢沅「苟且」義，雖不相同（俞樾《平議》亦用畢沅義）⁶⁵，但念孫用以闡述語義「曩時則以生為急，今時則以義為急」，與原本墨子詆孔子「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鮑，則偽行以自飾」，意義完全一致而無牴觸。則念孫雖為經儒，遇到墨子譏詆孔子的話語，亦能客觀注解，發明墨子的思想。

（七）諸子源流

《雜誌》「淮南內篇·第二·雜道以偽」：

「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高《注》曰：「雜，粗。」念孫按：「雜」當為「離」，字之誤也。「儉」讀為「險」。（原注：險儉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惠而不儉」下。）《莊子·繕性篇》：「德又下衰，* 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原注：郭象《注》：「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此正《淮南》所本。《文子》作「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又本於《淮南》。然則原文作「離道」明矣。⁶⁶

雄按：本條屬「以諸子互證」之例。互證的方法，本係治經常用的方法。念孫治諸子，其取證的先後順序，大致上是先取本書自證，兼取古代語言故訓旁證，然後取同一書的其他鈔本自證，或取舊注作內證，或取同時期的經書或諸子書互證，或取屬於同一思想學術源流系統的典籍互證。總之愈與原文的關係相近，則取證的優先順序愈前。此條之中，念孫指出《莊子》為《淮南子》所本，《文子》又本於《淮南子》，也就等於說明了《莊子》、《淮南子》及《文子》三者之間的傳承關係。又如道家典籍論人類生死形骸，有「形」、「形形」，「生」、「生生」等觀念，如《列子·天瑞》篇所稱「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

⁶⁴ 《讀書雜誌》頁 596。

⁶⁵ 參俞氏《諸子平議》或孫詒讓《墨子閒詁》卷 9 句下引。

⁶⁶ 《讀書雜誌》頁 778。

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雜誌》「淮南內篇．第十二．形之不形」條說：

「孰知形之不形者乎」，念孫案：「形之不形」，當依《莊子》作「形形之不形」。郭象曰：「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⁶⁷

念孫此條串聯《莊子》、《淮南內篇》及《列子》等書，而考訂「形形」這一屬於道家思想的概念，顯示他在展開校勘訓詁的工作時，也不斷在掌握諸子思想體系的特殊性。

（八）財貨

1897年章太炎在《經世報》發表 讀《管子》書後，論及文明、侈靡、工藝、貿易等相關的經濟問題，開始用先秦諸子的思想討論歷史現實的問題，較他於1906年在日本時於國學講習會講述諸子學，嚴厲評騭孔子及先秦諸子，尚早九年。諸子書中關於商品貿易之類的言論頗多，尤以《管子》為不少，而抽繹《管子》本文關於財貨問題的論述，《讀書雜誌》已啟其先。《雜誌》「管子．第一．百利不得」：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念孫案：「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百利得，則百事治矣。上文云：「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是其證。⁶⁸

念孫引述「上文云」，亦係以本篇本章自證。將此四句的文辭內容糾正過來，其中的關涉民生的財計思想即自然顯出。其後太炎發揮《管子》經濟思想，推源溯本，能不及於《讀書雜誌》嗎？「管子．第十一．正食」亦與上條略同：

「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引之曰：「正」字義不可通。「正」當為「乏」。乏者，匱也、絕也。《史記．高祖紀》曰「漢軍乏食」是也。乏食則不忍飢餓而為盜矣。

⁶⁹

此條念孫校正所憑藉者，主要為對古文字形的知識。除《管子》之外，墨子亦尚論經濟問題。《雜誌》「墨子．第一．故食不可不務也以下七句」：

「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畢本「力」訛作「立」，云：「立、節為韻，

⁶⁷ 《讀書雜誌》頁865。

⁶⁸ 《讀書雜誌》頁416。

⁶⁹ 《讀書雜誌》頁511。

主、御為韻。」念孫案：畢說非也。古音「立」在緝部，「節」在質部，則立、節非韻。（原注：原本「立」作「力」，「力」在職部，力、節亦非韻。）「主」在厚部，「御」在御部，則主、御非韻。畢未能了然於古音之界限。⁷⁰

這一條全屬於古音韻的問題，但如前文所述，念孫即使不就引述的原文作思想性的分析或義理性的發揮，只要原文本身具有哲理性，讀者在研讀《雜誌》時，就不可能不受影響。單以這段引文而論，嘉道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讀到首三句「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時，心中能無所感嗎？

（九）義理

「理」、「義」以及「理義」、「義理」等概念，是儒者恆言。關於先秦諸子對此等概念及其相關義涵的闡釋，歷來儒者很少論及，實則諸子之說可以與儒說互證。《雜誌》「管子·第六·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

「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引之曰：「禮出乎義」，當作「禮出乎理」。「禮者，謂有理也」，故曰「禮出乎理」。「義出乎理」，當作「理出乎義」。「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曰「理出乎義」。「理因乎宜」，當作「義因乎宜」。「義者，各處其宜也」，故曰「義因乎宜」。寫者錯亂耳，不然，則「義者宜也」，上言「禮出乎義」，而下又別言「理因乎宜」，是分「義」與「宜」為二也，殆不可通。⁷¹

雄按：禮為最外，內以理為基礎；理又以義為基礎；義又以宜為基礎。引之對於四者關係的分析，可謂極其清晰。此條值得喜談儒家義理的學者詳參。

（十）天大地廣

諸子對於人文世界的認知，為其義理價值的基礎；其對於自然天地的認知，亦與其思想有關。《雜誌》「荀子·第一·天見其明地見其光」條，念孫糾正楊倞《注》的說法，考證「明」、「光」二字，指出「光」讀為「廣」，又引《詩經·小雅·車牽》《正義》、《中庸》「高明，所以覆物也」句、《左傳》成十六年「今而明之其可乎」三處資料，證明「明」與「大」同義。念孫說：

⁷⁰ 《讀書雜誌》頁 561。

⁷¹ 《讀書雜誌》頁 467。

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原注：《繫辭傳》：「廣大配天地」，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廣配地也。〈中庸〉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博」亦「廣」也，「明」亦「大」也。）「故君子貴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

72

此處念孫講明「天大地廣」之義，則讀者自能明白所謂「故君子貴其全」者，即指君子應以天地為效法的對象，以廣大全盡為修身為學的目標，而荀子勸學的理念，亦得以進一步闡明。據此可見，王氏父子從諸子書所獲得的，並非如哲學家透過玄思冥索而得的義理，而是從辛勤的文獻工夫中提煉出來的義理。

（十一）莊子思想

傳統學者論先秦諸子文章的閎肆，往往推尊《莊子》；章太炎承繼清代諸子學的研究，撰《莊子解故》、《齊物論釋》，亦對莊子最為心折。《雜誌》於莊子思想觀念的考證不多，可能因為《莊子雜誌》為念孫未完成的初稿的緣故。但可以引述注意的亦不少。下引四條。第一條《餘編上》「莊子：與造物者為人，不與化為人」：

〈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應帝王篇〉：「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郭象曰：「任人之自為。」〈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為人。」郭曰：「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引之曰：郭未曉「人」字之義。人者，偶也；「為人」，猶「為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雄按：下略）⁷³

雄按：《淮南內篇·第一》有「與造化者為人，下與造化為人」條，亦為王引之所撰，辨正的內容相同，都是論「人」應讀如「相人偶之人」。《淮南子》高誘《注》訓「為」為「治」，「為人」即「治人」。引之說：

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為」為「治」。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為偶也。⁷⁴

以下即引《中庸》鄭《注》內容。「為人」一詞，《淮南子》的高誘《注》之訓為「治人」，有望文生義之嫌；《莊子》郭象（253-312）《注》之訓為「任人自為」，

⁷² 《讀書雜誌》頁 635。

⁷³ 《讀書雜誌》頁 1012。

⁷⁴ 《讀書雜誌》頁 768。

與郭象「自化」的逍遙觀念有關。而引之考證「人」讀如「相人偶」之人，「為人」即「為偶」，讀者若置之於《大宗師》篇，不難發現這一解釋始能與全文的思想呼應通貫，更可感到王氏父子的校勘訓詁為有思想的根柢了。又清儒論

「仁」，多以鄭玄「相人偶」之義解釋⁷⁵，第二條《餘編上》「莊子：擢德塞性」：

〈駢拇篇〉：「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念孫案：「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為「擗」；擢、擗，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曰：「擗，取也、拔也。」（雄按：原注略）此言世之人皆擢其德、擗其性，務為仁義，以收名聲。非謂塞其性也。《淮南·俶真篇》曰：「俗世之學，擢德擗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螻蛄振繆物之豪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擗取吾情。」皆其證也。⁷⁶

此條念孫亦能掌握莊子反儒的思想，了解莊子不滿於儒家仁義思想傷德害性，於是配合校勘訓詁資料，作出判斷。第三條《餘編上》「莊子：哽而不止則跄」：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跄，跄則眾害生。」郭象曰：「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跄，女展反。」《廣雅》云：「履也，止也，本或作蹶同。」念孫案：「踐履」與「壅塞」，二義不相比附。郭云「理有不泄而相騰踐」，所謂曲說者也。本或作蹶，亦非也。今案：跄讀為𨔵；𨔵，戾也。言哽塞而不止，則相乖戾；相乖戾則眾害生也。（雄按：下略）⁷⁷

本條念孫雖未論及莊子「道」的思想，但顯然對莊子「道通為一」的觀念有所掌握及理解，然後有「哽塞而不止，則相乖戾；相乖戾則眾害生」的理解。第四條《餘編上》「莊子：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篇》：「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郭象斷「天下多得一」為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念孫案：「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句法正與此同。「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下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即所謂「一察」也。若以「一」字上屬為句，「察」字下屬為句，則文不成義矣。⁷⁸

此條所引莊子的論點，係從「道通為一」的觀點譏評持其他方術的諸子「察其一

⁷⁵ 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八篇上「仁」字條《注》，頁365。又參阮元《學經室一集》卷8 論語論仁論，《學經室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冊一，頁157。文長不錄。

⁷⁶ 《讀書雜誌》頁1013。

⁷⁷ 《讀書雜誌》頁1019。

⁷⁸ 《讀書雜誌》頁1020。

端，而不知其全體」，念孫既對莊子思想有所闡發，而讀《雜誌》者亦可以儆然自省也。

四、 結語

乾嘉學者治經而強調經傳一體，已經突顯了經部文獻相互間的邏輯完密、相互一致的關係；儒者如萬斯大、毛奇齡、惠周惕等特別強調「以經釋經」、「以經解經」，更突顯了諸經之間為一整體的觀念。這些觀念，從文獻研究的角度而論，是屬於治經方法的問題；但吾人絕不能說，治經與思想絕無關係。方法的採擇、觀念的運用，其背後必有一種思想價值作為主體。從思想的角度看，清儒將考證的範疇主要約束在經部文獻的範疇中，實使經學研究達到極為精純的境界。而就在乾嘉經學最鼎盛的時期，王氏父子開始兼採古史諸子典籍中的古代語言與經書中的語言結合起來研究（《經義述聞》中例子極多，不遑列舉），並將治經方法中「以經部文獻互相釋證」的方法運用到諸子學上，「以諸子文獻互相釋證」，突顯了子部文獻彼此間的密切關係。換言之，由乾嘉治經書發展而至治諸子書，由乾嘉學者治經方法發展而至治諸子方法，由經學研究發展而至諸子思潮大盛，就是乾嘉學術演變至晚清學術的一個大方向、大潮流。由此觀之，乾嘉以後先秦諸子學的鼎盛，可謂清代學術一大事因緣了。

王氏父子的《讀書雜誌》主要用的校勘訓詁的方法來釐清諸子書中相關的問題，使不可讀的地方變為可讀（如脫文之類）；使不可知曉的地方變為可知曉（如文字訛誤之類）；使舊注訓解的正確之處和誤解之處都顯露無遺（包括漢魏注解以迄清人注解）。其中大部分的材料，固然與思想義理無關；但卻也有相當多的地方，念孫直接引述諸子書中具有義理的內容，或疏通了諸子書中相關的思想義理或概念，又或藉諸子思想觀念的掌握，以衡定字辭文句。我們固然不能說《讀書雜誌》是一部論述諸子哲理的著作，然而，從學術思想發展的脈絡看，我們卻可以肯定一點：諸子思想在清中葉後得到發皇，其起始點就是在乾嘉經學家以治經的方法治諸子書的成果之中。若吾人說晚清諸子思想復興的線索，可以在《讀書雜誌》這部鉅著中尋覓而得，應該是不過分的。

《讀書雜誌》一書絕非只有校勘訓詁。正確地說，王氏父子是以訓詁為基礎，釐清諸子書的語義文義，復以校勘證明其訓詁不誤；有時藉訓詁和校勘證明名物制度；有時也會藉由某一子的思想觀念，來證明其文字語言內容應作甲而非作乙；有時則藉由文獻的比較，證明同屬一思想流派的幾種古籍前後彼此相承的關係。從種種跡象顯示，念孫面對著這一大批充滿脫文、衍文、錯簡、訛誤的先

秦文獻，他是先對於其中各種子書中的思想內涵先有了相當程度的掌握後，才進行疏釋校勘的工作。他時常用兩部子書的內容文辭意義互相疏證，足以證明這一點。

先秦諸子思想中，除最早的儒家以外，其餘諸子立論，每多批判儒學，老、莊、墨、韓等無不如此。而其反儒非儒以外，又各自建立其完整的思想體系，足以與儒家的價值體系並立。對於乾嘉時期的儒者來說，先秦諸子學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其時經學發展至極盛，而國家衰象也漸呈露。據昭槤《嘯亭雜錄》所記載，當時滿洲貴族已趨腐化；龔自珍《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也論述了清中葉官僚制度僵化，考試制度無法培育人材等問題；洪亮吉（1746-1809）《卷施閣文集·意言》則論及人口增長所連帶產生的糧食分配、生產、貨物流通等問題。這時期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等各個層面存在的問題，都可謂極其嚴重。這些國家社會的衰象，與學術界經學研究的極盛，一悴一榮，恰為相對。經學的最高理想應該是要經世的，治經學者無法扭轉當時的政治環境，則他們心裡的苦悶，是可想而知的⁷⁹。在當時的儒者同感經史考據無法圓滿解決國家社會人生現實問題時，諸子學說未嘗不能提供另一種可能性，也可以說是另外的出路。我在兩年前曾提出：尋求思想的解放，是乾嘉以降學者治經而外，兼治諸子的重要原因⁸⁰，主要就是基於這一個想法。

諸子學復興解放了近代思想，這是梁啟超早已指出、也是近世學者大多了解的事實。然而我還進一步認為：諸子學興起的起始點，原來是深深埋藏在乾嘉經學家堅實的經學研究、和枯索零碎的校勘文獻工作之中的。借用近年來大家都喜用的「內在理路」的觀念來解釋，諸子學興盛所引起近代思潮的轉變，其內在理路即在於乾嘉經學研究之中。這是一個極為有意義的現象。吾人唯有深入相關校勘訓詁的文獻，才能將這個線索看得更清楚些。

⁷⁹ 章學誠晚年有「上大學士論時務書」、段玉裁讀龔自珍《明良論》而稱「髦矣，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可證。

⁸⁰ 參拙著《錢穆先生治學方法的三點特性》，發表於《文史哲》2000年第2期，頁22-26。

